

# 马背上的“好曼巴”

□ 温宝臣



吴天一，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医学（高原医学）专家。1956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现任青海高原医学研究院研究员，卫生部高原病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科技部高原医学研究国际重点实验室主任。



## 院士的正能量

□ 温宝臣

8月13日，初到海拔4200多米的青海玛多县。由于高原反应，我一夜没睡，翻身时用力稍大就感觉脑仁像要蹦出来似的。这种痛楚，让我联想着吴天一院士行医的意义。

8月14日上午，跟随这位78岁的塔吉克族老人，来到海拔4610米的玛多县牛头碑。面对黄河源头那碧绿如洗的青青草原，老人吐露心声，“作为高原的儿子，我要为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奉献我的一生”。响亮的声音在措日尕则山顶激荡，让每一个在场的人为之动容。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觉到吴天一这席话的悲壮。

带着热情，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做一辈子，并用这种热情感染周围的人，这就是吴天一院士的正能量。如今，在吴天一周围，形成了一支敢于吃苦，甘于奉献的年轻科研队伍，他们是高原医学研究的后备力量。

有位作家说过，人可以穷可以富，可以细可以粗，可以雅可以俗，但“士不可不弘毅”，总要对得起流金岁月，高天厚土。吴天一院士多年的坚持，为高原群众健康和国家西部建设所作的努力，可以让他在回顾一生时毫无愧色。“马背上的院士”的经历也在提醒我们，如果能够带着热情坚持去干一件事，自然不会平庸。

初见吴天一院士，78岁的他刚从北京开会返回西宁。身材不高却精神矍铄，举手投足间传达出智慧和学识，让人如沐春风。从他的谈吐中，也能读出自信、乐观与从容。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扎根青藏高原，深耕高原医学，为藏族同胞带去安康，被亲切地称为“好曼巴”（好医生）。更为重要的是，长时间、大规模的实验数据为高原病防治提供了支撑，中国高原医学研究因而走在了世界前列。几天的接触和交流中，过往岁月如画卷般徐徐打开。

### 偶入高原便扎根

1937年，吴天一出生在新疆伊犁一个塔吉克族的知识分子家庭，取名依斯玛义·赛里木江。后随父母去南京生活了9年，于是，他有了汉文名字吴天一。1951年，吴天一考入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即与妻子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平壤医院工作。1958年，他又响应祖国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来到青海，与山东、河南的大批青年共同支援当地建设。

湛蓝的天空、皑皑的雪山，青藏高原美丽的景色让边疆的年轻人着迷，然而这种愉悦很快就消失了。缺氧、疲劳、头痛欲裂等一系列的高原反应，击倒了不少初来青藏高原的年轻人。对于有着医学经验的吴天一来说，治病救人和寻找病因就成为他工作的重点。随后他又听说，在一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有士兵发生急性高原病，造成部队减员。经济开发和边疆防卫同时被高原病困扰，这深深地刺激了吴天一。

就是从那时起，他萌发了寻找有效应对高原病办法的念头，也正是从那时起，他把研究方向锁定在高原医学领域。经过诊治大量患者，吴天一认定这是一种高原环境的特发性疾病。环境流行病学研究要对自然人群的普查率达到95%以上，才能准确掌握疾病分布和患病因素。吴天一开始了数十年如一日的临床观察。

青藏高原面积达257万平方公里，平均

海拔超过4000米，是吴天一的天然实验室，高原原著居民是最好的样本。然而，高原恶劣的气候条件同样考验着他的身体和毅力，这项研究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条艰苦的探求之路。

牧区居民居住分散，又会随季节变化而小范围迁徙，有时候走了几十公里才见到一个帐篷。高原的天气像小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刚刚还是晴空万里，马上又大雨倾盆，没准还加上些冰雹。冬季早晚的温差更是惊人，随身帐篷只能起到遮风作用，和衣而眠就成了常事。

吴天一说，“青藏高原恶劣的环境，对从事高原医学研究的人来说却是宝贵的财富。与缺氧环境对抗，是科研人员的基本功”。

“青藏高原独特的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为科研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资源，所以说，青藏高原是我科研的根，甚至也可以说是我生命的根。”吴天一深情地说。借助这些根系提供的营养，吴天一在高原医学领域取得骄人成果。

### 辛苦耕耘结硕果

上世纪70年代末，吴天一从部队转业到了青海省人民医院，在他的推动下成立了“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此后，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逐步启动。

1979年至1985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6年之久、覆盖5万人之众的急慢性高原病大调查。他对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果洛、玉树、唐古拉等地藏族和汉族牧民体质特征和各种急慢性高原病进行调研，并先后治疗了2万多例患者，获取了大量的临床资料和数据。

1990年，为了阐明人体从低海拔急速进入高原后生理和高山病发病规律，53岁的吴天一带领中日联合考察队到海拔6282米的阿尼玛卿雪山进行实地考察。在海拔5000米进行高山生理实验10天后，日本医疗队因出现急性高原反应停下了脚步，而吴天一则带领中国考察队继续行进在冰天雪

地中。吴天一坚持登上海拔5620米建立实验站，并详细记录了各种实验数据。

阿尼玛卿山实验收集了不同海拔的人体生理数据，借此形成了不同人群在海拔2300米、海拔3719米、海拔4660米、海拔5000米与海拔5620米的对照，使高原医学又迈上新的台阶。为此，国际高山医学会在第四次国际高山医学大会上授予吴天一“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1997年，国际高山医学学会要给急性高山病、慢性高原心脏病制定一个标准。吴天一率先领导国内专家建立了中华医学学会高原病的统一命名、分型和诊断标准。2004年，第六次高原医学会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吴天一经反复验证后提出的量化诊断标准得到一致通过，弥合了存在于国际医学专家之间的分歧。在为标准命名时，会议工作人员建议是否可以命名为“悉尼标准”。“我当时就说‘不’，要叫‘青海标准’！”吴天一回忆说。这一国际标准，也成为中国医学界的第一个国际标准。

时光荏苒，高原送走了一批批南归候鸟，吴天一却策马扬鞭走遍了青、藏、甘、川的大部分高原。从第一个披露高原肺水肿病，到第一个报告成人性高原心脏病，再到第一个报道高原红细胞增多症，吴天一以高原低氧适应生理学的研究为重点，系统地研究了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各型高原病，创建了慢性高原病量化诊断系统。

### 千里天路显身手

吴天一的科研成果，在新世纪发出了更耀眼的光芒。2001年，韩红歌声里的“天路”——青藏铁路破土动工，数万建设大军将奋战在高海拔地区，吴天一说，“我似乎觉得我自己更有用武之地了”。

青藏铁路的开工牵动着亿万人的心，而铁路建设中的卫生保障是高原铁路建设3大难题之一。有着多年高原医学经验的吴天一被任命为铁道部青藏铁路一期建设的高原医学顾问和二期建设的高原生理研究



院士风采



组组长。吴天一回忆说，“很庆幸，我有超前意识，加上天时地利与人和，我的高原适应性研究和高原病防治的路子走对了”。

当被问到如何确保筑路工人的安全时，吴天一说，“从大处说，我首次提出包括糖尿病、冠心病等14种疾病患者究竟能不能到高原参加高强度劳动的问题，并确定了一些具体的指标。在细微处，考虑得更加细致。比如说，根据青藏公路的建设经验，我建议为工人提供带有暖气的卫生车，防止工人起夜患感冒，大幅降低了脑水肿和肺水肿等高原性疾病的发病率。我和同事共同研制的抗缺氧药物及保健品，也发挥了作用”。

在青藏铁路的建设过程中，吴天一和团队针对大群体、高海拔、长期施工的特点，提出急性高原病抢救“高压舱、高压袋、高流量吸氧”及“低转、低转、再低转”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以及一系列卫生保障方案。在施工的5年中，共计超过14万的筑路工人中无一例因急性高山病死亡。

在世界第六届高原病医学大会上，国际专家对于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零死亡将信将疑，提出了现场观察的要求。吴天一随即带着170多名各国专家来到施工点上，当他们亲眼目睹了高原氧舱和各种高水平的医疗设备时，没有人再质疑，都认为这是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也就是在青藏铁路开工那一年，吴天一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青海省唯一的院士，也是塔吉克族唯一的院士。

### 为医学攻关到底

吴天一很是怀念过去的日子。每次为藏胞看完病，已经走出很远，回头看见他们还在帐篷口不停地挥手道别，那一刻，吴天一心里是满满的幸福。现如今，吴天一每年还会带领队伍到青海条件最为艰苦的黄南、果洛、玉树等地巡回义诊，每天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藏胞超过200人。“的确很累，但也说明那里很需要我。”吴天一说。

吴天一对藏胞有深厚的感情，他说，“从西藏的亚东，到珠穆朗玛峰上的营地；从青海的西宁，到果洛的阿尼玛卿雪山脚下，我们所采集的2万多份血样，大多都是当地的藏胞无偿提供的，这是我们研究藏族高原最佳适应性的第一手资料，比什么都宝贵”。

跑遍了世界上所有的高原，吴天一发现，没有哪里像青藏高原这样高的海拔，长时间居住数量如此众多的人口。为此，他说高原医学只能诞生在青藏高原，自己扎根青藏高原是幸运的。他拒绝了国外很多高校伸过来的橄榄枝，认定了离开青藏高原，高原医学研究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吴天一说，自己最骄傲的时刻，就是站在国际高原医学论坛讲台上，讲述来自青藏高原的新发现，获得掌声，为国争光。

“中国是高原大国，高原人口众多。高原适应问题、高原病防治问题，都是必须要解决的。”在吴天一眼里，这是倾注一生要做的事业。他说，“随着西部的不断开发，到高原来旅游、创业的人越来越多，作为一名科学家，肩上的担子还很重”。

身上的“零件”在多年坎坷的科研生涯中修了好几茬，但这并没有阻挡吴天一科研的步伐。年近八旬的吴天一，工作热情一如当年。“高原医疗工作，由于缺氧环境，非常艰苦。不要说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就是青年人、中年人都要经受考验。但我是专门从事中国高原医学研究的，肩负着这片土地上人民健康的保障，所以生命不止，研究不止，要为这个事业攻关到底。”吴天一如是说。

## 用左笔反体书法传播中国文化

孙浩茗口述 陈颐整理

“体”，顾名思义是用左手写出完全相反的字来，尤其是左右开弓，双手并用，写出一正一反的字来，其难度可想而知。

上世纪80年代初，又一个偶然事件让我展示了左笔反体字的魅力。单位领导同志打来电话，要我记录一篇由他口述的重要稿件。慌忙中，我用右手握着电话，只好左手记录。没承想，竟用左手洋洋洒洒地写了3页纸的反体字！领导让我复述时，我只好翻过来对着有阳光照射的窗户念了一遍。领导在电话那头听了半天，也不太清楚用左手写反字是什么概念，就要求我用毛笔再抄一遍报给他。而那几页被领导称为“不可思议”的左手反字，后来也被领导要走并珍藏起来。

又过了10年，一次我作为公司董事长宴

请几位要客，席间一位书法家为每人挥毫写了一幅幅苍劲有力的字。我为“助兴”，也在两张大宣纸上左右开弓，同时落笔，写出了一正一反李白的诗句，当时举座哗然，掌声一片！这些年，在繁忙的工作和社会活动之余，我渐渐全身心投入到了用左笔反体手法临写各类名家碑帖，并在这一领域里徜徉至今。

2010年10月，在上海世博会举办的一次大型义拍活动中，我的一幅11.66米长卷《千字文》拍出了17万元高价，夺得当晚义拍冠军！款项全部捐赠给了贫困山区儿童。我本人就是穷孩子出身，没想到我的字还能为贫困儿童做点点好事，真是既荣幸又高兴。这件事进一步激起了我写左笔反体字的兴趣和干劲。近几年，我持续写了一批长卷、中卷和

短卷达数百幅。临写的大量古诗词和领袖诗词等中国古典及现代文学作品，有的长达数十米、上百米，受到书法界及社会广大书法爱好者的认可。

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书法至今仍焕发着璀璨的光芒。2012年，我作为“中国奥运文化代表团”成员，应邀前往伦敦进行文化交流活动，我的左笔镜体线装书成为代表团的重要礼品。在伦敦泰晤士河大型巡游中，我向中外宾客展示了中国“左笔反体书法”的美感与魅力，并为在场的众多名人题写字幅，赠送书法作品，引起不小的轰动。

在生活中，我一直以自己是个中国人而自豪，坚守着自己的“三个三”原则，即“三心”“三大”“三扛”。“三心”是指做人要有爱心、责

任心、事业心；“三大”是指行事要大方、大量、大气；“三扛”是指男人要扛得起世界，扛得起社会，扛得起家庭。生活中，我是有原则、有理想的人，书法道路上自己也有自己的追求和目标，这就是不断探索开拓、使作品精益求精，力争尽量完美，让自己的左笔反体书法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我今年76岁了，还担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兆日科技公司董事长。经常有人问我，你工作和社会活动如此繁忙，怎会对左笔反体书法会这样乐此不疲呢？我的想法是，中国书法博大精深，是一座永远开采不完的富矿。因左笔反体书法所展现出的“新、奇、巧、美、难”等独有的特点，我能在浩瀚无垠的书画苑中尽自己的微薄绵力，走前人和国人早已开通的左笔反体书法蹊径，沿着这条“羊肠小道”走下去，或许能为中国文艺百花园增添一丝新鲜空气，或增添些许乐趣，抑或作为受评判的靶子，供专家学者及书法爱好者品评、议论、指点，从而对中国书法的创新、推进与发展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用左笔反体书法传播中国文化，是我今生最大乐趣，也是我孜孜追求的中国梦！